

传统文化对国民公共精神的影响

刘利敏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咨询部,合肥 230059)

摘 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公众公共精神的打造。传统文化对民众的公共精神塑造有着深刻的影响,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强大的家族主义意识,长期的封建专制,公共生活有效载体的缺乏,都不同程度地制约和阻碍了中国人公共精神的成长。为此要积极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培育当代民众的公共精神。

关键词: 公共精神; 社会治理; 传统文化; 家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志码:** A

公共精神是指“在充分了解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相关性的基础上,对公共制度和公共事务有充分的认识和评判能力,并且积极参与,愿意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情感、理性和精神”^[1]。公共精神是当代公共生活领域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道德准则,是一国公民基本道德素养的反映,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公众的公共精神关系到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政府的治理水平与社会的和谐。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历史新时期,社会各种思潮泥沙俱下,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们的公共空间日益扩大,公共事务日益增多,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面临着重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去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全体社会公众的参与,离不开公共精神的打造,可以说社会民众的公共精神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和水平。

一、中国人公共精神的过去与现状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几乎

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辛亥革命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从文化层面进行反思。“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然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2]264},于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契机,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梁漱溟等人。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贫、愚、弱、私”是中国人的四大根病,是导致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其中中国人之缺乏公共精神,更为许多人所诟病。梁启超把缺乏公共精神的人称之为“旁观者”,他把旁观者分为六类,分别是“混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分别为他们画了像,并对其痛加批判,“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人类之蠢贼,世界之仇敌也”^{[2]70}。梁漱溟指出,“中国之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西洋的社会人生,偏是集团的、积极的、斗争的、强有力的,正好两相反。若特指其失败之处,那要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3]49}。鲁迅和柏杨等人都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旧国民的国民性。客观地讲,因为当时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仁人志士自然不能不振臂

疾呼,遂对中国国民性之弱点进行猛烈抨击,以期唤醒民众,拯救我中华民族于水火,言辞难免有过激之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教育的普及使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有机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人们的公共精神远非昔日可比。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上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倾向,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权力的家族化,商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罔顾社会责任的现象,学术腐败,各行各业无不受其负面影响,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道德垮塌,更无论社会公德。另外由于对西方民主的错误理解,自由在不少人眼里成了不受法律制裁的为所欲为和个人的极端自私,有的人以网络自由为借口侵犯他人隐私,制造谣言和混乱,在现实社会中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另外一些国人在公共领域缺乏公德,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涂乱画、大声喧嚣,令人深恶痛绝。

不少学者将中国公众缺乏公共精神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思维导致的个人利己主义无限扩张,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发展严重不足,国家与社会长期的高度重合,社会组织发育迟缓,社会原子化的加剧,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人的公共精神问题。

二、传统文化对公众公共精神的负面影响

公共精神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与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精神特质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其根源却在文化习性,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一)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造成关系本位

梁漱溟认为“有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贫愚弱私;岂不知贫愚弱私乃不进步的结果,不进步的现象,并非不进步的原因……中国不进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个社会构造问题……”^[4]。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他对中西方社会结构做了形象地说明与对比,他说:“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

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5]。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每个人以自己和家庭为中心层层外推,最终形成“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大人伦,把“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看作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格局中,每个人按照他人和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进行差序之爱,越近则关系越近,越远则关系越远,而对关系较远的人或陌生人如何相处,却很少考虑,从而形成一个个的小圈子。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影响下,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本位、熟人本位、圈子本位和关系本位,部分中国人做任何事喜欢找关系,走后门,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这种差序格局对公共精神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二)强大的家族主义意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

民国学者在反思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原因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中国的家族制度。林语堂指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6]。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主义”特点,以家庭为本位,过分强调家庭,因为中国传统伦理崇尚“尊尊亲亲”的缘故,从而容易造成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最高统治者皇帝,实行“家天下”的策略,用“天下”和江山社稷养其皇亲国戚,行其大“孝”;士大夫们以自己的爵禄采邑养自己的宗亲姻戚,行其中“孝”。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任用私人、利益均沾,非但成为了古代官场惯例,而且往往成为光宗耀祖的事情,在乡里传为美谈。如果有人不按此套路出牌,或反其道而行之,则被人称为六亲不认,数典忘祖,被同事和乡里人所耻笑。如此一来,私德不但阻碍公德的推行,而且破坏了公德,公共机关和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都被用作“尊尊亲亲”的手段,成了少数人寻租的工具,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便很难避免。

在家族意识的熏陶下,官员往往因私废公,造成“国”与“家”意识的悖论。林语堂指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与公共精神之间经常存在矛盾,在家族制的影响下,官员往往把政治与道德相混合,最终结果造成一个官员为了老婆孩子家庭拼命搜刮钱财,其结果对家庭有优良的成效,而对于国家来说,则为巨大的危害,“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6]。这也就不难理解过去及

当今社会存在的权力家族化、私有化的原因了。

(三)封建专制的历史抑制了公共精神的成长

中国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历史,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异己和所谓不安分的分子采用高压政策钳制思想和舆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就是典型的文化恐怖政策。知识分子为了明哲保身起见,不敢对社会和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者像清朝的儒生一样去玩弄辞章和考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7]。

封建统治者除了施行政治高压外,还实行愚民政策,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奉为圭臬。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推行的“八股取士”制度,都极大地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在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和政治高压政策的双重影响下,民众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权至上的等级观念,权力崇拜和服从成为人们的政治信条,个性与自由被极大地压制,个体的独立精神和社会的公共主体的意识无从伸张。这种心理影响到整个国民,并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体公共精神的发展进程。

(四)缺乏公共生活的有效载体

传统中国农村,家族往往以血缘和姓氏为基础聚族而居,久而久之,形成了乡治,即农村家族自治。在施行乡治的农村,人们自办教育,互相帮助,周济贫困,自行其政教,由年长者带领族人在祠堂祭祀,处理家族内或村庄里的争端,除了赋税钱粮之外,人们很少与官府打交道,人们很少到官府进行诉讼,避官府如避瘟神。自治下的农村,民风醇厚,但是老百姓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很少与外界接触,从而减少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不利于公共意识的培养。

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提倡“束身寡过”的个人修养,士大夫常抱独善其身主义,“出于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成为他们的信条,最多也不过“处士横议”,不愿过问一切公共事务。孔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很能说明传统社会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结果土豪劣绅大可武断乡曲,横行无忌,贪官污吏也尽可鱼肉百姓,造成了政治的黑暗。

张君勱认为,相对于西方古希腊就有民主政治,罗马有共和政治和元老院,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中国人缺乏西方人那种参政议政能力。

梁漱溟认为,西方公共精神主要缘于其特有的阶级制度和宗教。西方古代有贵族、僧侣、农奴和城市工商业者等阶级,以及后来的新兴资产阶级,而中国天然没有阶级,是典型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也就不会形成相应的团体。所以“农民与手工业者,散漫得最厉害,自己绝不能结合,天然不能成一集团势力”^{[3]83},“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自由、散漫、散荡、个性强、浑身上下净是反团体的习惯,他那种大爷脾气,叫他成为一个结实团体,遵守铁的纪律,是不可能的”^{[3]84}。另外,“西洋之有团体从有宗教来;中国之缺乏团体,从缺乏宗教来。”^{[3]50}梁漱溟认为,因为西方有宗教,所以一直以来过的是团体生活,经济政治都是这样,形成了很强的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相反,中国人没有宗教,只有“身家”,在梁启超和梁漱溟看来,中国人开口闭口都是“天下”,“四海一家”“天下为公”也都挂在嘴边,可以说是大而无当,不着边际。可是小起来又特别小,中国人联系最密切的却是“身家”,没有一个合适的团体。西方人则不一样,西方他们有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宗教、行会等团体,正好培养团体生活。由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所以呈现散漫无力的状态,从而也很难培养出来西方的公共观念。

三、培育当代民众公共精神的路径选择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影响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传统文化中公共精神的缺乏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文化基因的生成和消失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客观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民族情感归依、心灵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建立在该国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当今世界仅存的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独特的优势,这一点梁启超、胡适、林语堂、梁漱溟等人都有大量论述。比如梁漱溟指出,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团体生活,“过着几千年散漫、放任、和平和幸福的日子,而免去许多教派之争、阶级之争、国族之争的惨祸;便不得同化融合许多外邦异族,而扩大其民族生命并延续其民族生命到现在”^{[3]52},可以说,中国人散漫背后同时隐藏的是人的智慧和理性,成就了智慧的生命。

当代中国人公共精神的成长和培育,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即需要充分利用传统与现代

的本土资源,而不是简单地移植国外经验,顺应历史潮流,最终实现公共精神由内生、自发向制度建构延伸,由宗法、伦理向契约精神转型,从熟人社会走入公众世界。

(二)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客观地说,各国文化心理结构皆有优劣,对此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应该承认,我国传统文化中公共意识少,但是在个人修养以及与他人相处方面强调忍耐、中庸、和平、安分守己等社会意识在当今仍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虽遭受冲击但并未解体,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有很大程度的交集契合,并可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应将传统文化中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赋予其新的内涵,注重从社会民众的心理结构出发去激发民众心底的公共意识。而对于与现代公共精神背道而驰的部分,则应进行积极地扬弃。

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对待传统文化时,不是去从根本上铲除,而是精心地去经营它、完善它,实现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创造性地互融,使传统文化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自治等新时代理念下逐步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和功能优化。笔者认为,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积极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1. 激发“熟人社会”的奉献和利他意识

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本位和亲情至上,虽有许多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安身立命之本。在传统血缘共同体与地缘共同体组成的熟人社会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互助精神,“尊祖敬宗睦族”的团体意识,其所体现的奉献、利他意识和行为是传统社会公共精神最重要的传统资源之一。我们应看到,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社会关联,相对于原子化的人际关系来说,具有更强的公共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社会流动性加快,传统的以交往、互助和信任为特征的“熟人社会”日益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将面临更多经济共同体因素的注入,对此,我们要适当发挥熟人社会的作用,将熟人社会中的利他意识和行为,以社会组织等关联方式向公众社会延伸,从而促进关系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的转型。

2. 发挥“礼”在当今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传统中国把礼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手段,强调以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从而形成对每个家族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礼治”文化。“礼治”文化,强

调礼义廉耻,注重伦理、教化、规范与秩序,这与现代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是相一致的。在社会利益急剧分化,社会道德滑坡的当下,“礼”对于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规范个体行为仍具有现实价值。在当前,充分发挥“礼”在当今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有助于端正和净化社会风气,促进家庭和睦,实现社会和谐,也是对公共精神的一种有力推动。

3. 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中“公”与“私”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私之辩始终是一条主线。传统道德强调“公义胜私欲”,“以公灭私”,从而形成了浓重的崇公抑私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过分强调“公”而忽视了个人利益和个人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个性,反而不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对此,在当今社会,我们除了要继续发扬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优良传统,还要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立性,注重个人正当利益的维护,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中“公”与“私”的关系,培养人的健全人格,为公众公共精神的培育打下扎实的基础。

4. 通过加强社会公共资源建设改造家族文化

傅斯年指出“一个人当了官以后,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都会找上门来,求他办事,于是把官员弄得不得不违反原则,迁就别人,弄得自己失去独立性,甚至违法乱纪,弄得神昏气殆,弄得无法为公”^[8]。吴景超在《知识分子下乡难》一文中指出,“乡村中如出了一位知识分子,不但他的家人对他抱奢望,就是其余的宗族亲戚朋友,都天天盼望着这位知识分子做点大事业出来,然后去提拔他们”^[9]。

上文傅斯年和吴景超指出的情况,在当今社会仍然普遍存在。表面上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权力至上、官本位、人身依附、特权思想,实际主要是因为公共社会资源缺乏,优质资源稀缺,资源的配置不够公开透明,市场机制没有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当人们还无法通过公共体系获得生存发展和权益保障时,就会求助于私人社会资源和私人关系,家族血缘的纽带就会进一步强化。

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加大民生投入特别是优质资源的供给,建立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分配、使用 and 管理的公开透明机制。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加大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加大反腐力度,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当每个人只需通过公共社会资源而无须依靠个人关系就能保障自己应有的权益时,人们就会自觉摒弃家族意识,而代之以契约、规则和法律意识,这对中国人公共精神的提升将大有裨益。

5. 借鉴传统文化,进行制度创新

团体精神、公共精神、公德天然是和制度、法治联系在一起的。胡适指出,“人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中国有句古话:‘先小人而后君子’,先要承认人性的脆弱,方才可以期望大家做君子。……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舞弊的习惯”^[10]。在加强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要在立足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相应吸收借鉴西方经验,根据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制度设计,使制度更具有针对性。

比如作为古代官员选拔制度的科举制,通过把权力社会化、公开化、透明化,沉重地打击了裙带关系,有效地避免了权力的家族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选贤任能。科举制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杰出贡献,科举制公开选拔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优秀人才,保证了中国一千多年来的长治久安。当然,科举制也被许多人所诟病。今天,我们在干部人才选拔上完全可以借鉴古代的科举考试经验,加大官员选拔过程的社会化、公开化和透明化过程,对官员选拔的方式和内容进行创新,以官员选拔方式的创新来带动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创新。

6. 以强有力的政府推动来塑造公共精神

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病在散漫,救之之道,在于团结组织”^{[3]63}。在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中,中央政府都有着强有力的权威。近年来,党和政府在引导公众合法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方面进行了积极

有效地探索,如各种听证会,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为每一个人提供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机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我们可以借助国家大力反腐的契机,来调动民众的积极参与,给民众关注公共事务和改变社会的实践机会,提高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提升民众的公共精神和主人翁意识。

参考文献:

- [1] 赖纯胜. 和谐社会建设中民众公共精神的培养困境及其破解策略[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1): 96.
- [2] 梁启超. 梁启超经典文存[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 [3]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4] 梁漱溟. 人生的艺术[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2.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24-25.
- [6] 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67.
- [7] 柏 杨. 丑陋的中国人[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5: 17.
- [8] 傅斯年. 现实政治[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25.
- [9] 谢 泳. 独立评论文选[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 163.
- [10] 姚 鹏. 范 桥. 胡适散文: 一[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141.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National Public Spirit

LIU Li-min

(Research Advisory Department, Anhui Economy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Hefei 230059,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reation of social public spiri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hape of the public spirit. The differential pattern of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strong family consciousness, the long-term feudal autocracy, absence of effective carrier of public life and the things like that all restrict and hinder the growth of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pirit. As a result,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 cultivate the public spirit of the contemporary people.

Key words: public spirit; social governance; traditional culture; family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 任中峰)